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李宏亮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要]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关键词] 英汉语言共性; 英汉语言个性; 思维共性; 思维个性; 汉语个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9)05-0066-05

关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也即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包括汉语和英语的异同问题,在语言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两派对立的观点或对立的研究思路。一派孜孜以求语言的普遍性或共性,以美国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为代表,力求找出语言的普遍规则,这一点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他们致力于研究二者的不同,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有一些国内学者热衷于寻找语言之间的普遍性,比照英语研究的一些“普遍性”,汉语研究积极向其靠拢。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英汉语的异同?导致二者异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首先对求同和求异两派观点做一概述,然后从思维的角度探究英汉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一、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一) 语言的共性研究

目前关于语言共性问题,有两条代表性的研究思路。一条是以美国乔姆斯基(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主张通过对一种语言做深入的研究找出蕴含在语言中的普遍“参数”。普遍语法假说为其整个理论的基石。普遍语法认为,在人类成员的心智/大脑中,存在着由生物遗传而天赋决定的认知机制系统。Chomsky把这些认知系统称为心智器官。决定构成人类语言知识的是其中的一个系统,他称之为语言机能(language faculty)。这种研究思路,将语言

从本质上定义为心智实体,它是对实在于大脑中的语言心智机能抽象地研究和刻画,最终是对大脑机能的研究和刻画,所以生成语法走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子^[1]。195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这种学说的诞生。最先起来响应的有语音学家M.哈利,语义学家J.卡茨,句法学家P.波斯塔尔,心理学家J.A.福多等。这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学派,在几年内就一跃而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要流派,引发了语言学界的革命,至今仍然在语言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乔姆斯基1965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成语法系统,包括语类、转换、音系、语义4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有一定的顺序关系。每个子系统都有一套规则,规则之间有一定的使用顺序,像用数学公式一样,逐步推导出句子来,不同的规则推导出不同的句子。这样,生成语法系统好比一部机械装置,运转起来能够生成某种语言中的一切合格的句子,而且只能生成那些合格的句子。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生成语法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理论、标准理论及其扩展条件理论、原则参数研究方式,一直到最近的最简方案,不断发展,甚至完全推翻了一些过去的理论。

另一派以格林伯格(Greenberg)为代表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思路。他们从研究多种语言出发,主要采用归纳的方法来发现语言的共性。语言类型学的特征在于“数据-统计-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范式。具体来说,语言类型学是通过跨语言比较,通过大

[收稿日期] 2008-05-29

[作者简介] 李宏亮(1979-)男,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量的语言考察、统计和对比,观察存在于这些语言背后的起制约作用的普遍性因素。这些普遍性因素造就了人类语言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普遍性因素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语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语言形式却不能被接受。虽然生成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思路不同,但在“语言的共性主义”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甚至在把语言的最终解释归入生物方面这一点上,他们具有更高目标的一致性。

以上介绍的语言共性说曾经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但近年来关注普遍语法,语言普遍性似乎又开始热起来了,出版了一些有关语言共性的论文和专著,如程工的《语言共性论》,从生理学、心理学、儿童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等角度论述了语言共性^[2]。有的文章论述了语言普遍性的多维度存在。语言普遍性并不仅限于句法和语用两个方面,事实上还存在于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各个维度中^[3]。

(二) 语言个性研究

与语言共性相反,另一派学者着力强调语言的差异性、民族性,持此观点的学者同样很多,尤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为代表。他提出语言世界观的思想,即“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他说:“我们在研究中就必须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的差异上,而这种差异并不能追溯到一个语系最初的统一性。事实上,这样的差异首先要到语言方法与语言有限的努力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之中去找。”^[4]后来的人类语言学者沃尔夫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夫-萨丕尔假说”,这一假说包括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两个内容。基本思想就是语言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思维,不同的民族语言决定着不同的民族思维。尽管这一假说遭到了很多批评,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密切关系。而后来,随着生成语法的式微,逐渐兴起的在我国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在俄国兴盛的“语言个性”研究,都强调了语言的差异性。潘文国教授专门撰文指出“语言学是一门人学”^[5],他所倡导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思路要以求“异”为主。而关于探讨语言差异的文章可谓不计其数,不少学者探讨了中英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篇章等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其差异目前被语言学界普遍概括为形合与意合的差异,即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对于英汉语这种重要区别,王力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

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6]

由此看来,语言学界历来对语言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一派强调语言共性,一派重视语言的个性研究。这两派观点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语言观不同。根据潘文国教授的分析,从最本质的方面看,语言学界有史以来所有的语言定义可以划归为四类语言观: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和文化语言观(或语言世界观)^[7]。众所周知,语言甚为复杂,即包括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上述不同的语言观就在于对语言属性的侧重不同。侧重语言社会属性的是语言的交际工具观,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侧重自然属性的是语言的自足系统观和天赋能力观,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文化语言观强调人类的文化属性,主张用人文的方法研究语言。在这四种语言观中,最看重语言个性的当属文化语言观。他们坚持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着重联系民族文化去研究语言。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因此他们对语言个性的强调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反,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其他三派观点,特别是自足系统观和天赋能力观,由于语言观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客观性”,自然会强调语言的“共性”,发现语言的普遍性。

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语言的共性还是个性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世界上的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语言之间究竟是共性大于个性,还是个性大于共性?我们该如何看待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密切,要理清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只能从语言背后更深层的思维来看。

二、思维和语言

(一)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思维和语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关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普遍认为二者紧密联系并互相影响。在关于谁占主导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该派代表性观点是“沃尔夫-萨丕尔假说”。另一派观点认为思维决定语言,代表性观点是著名的“认知假说”,认为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

我们认为这是有道理的。首先,某些思维活动并不依赖语言,如艺术家的形象思维活动;其次,在英汉语当中都有一个出现新词语的语言事实,例如汉语中最近出现的“房奴”、“奔奔族”等词语正是因为有了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以及表达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的词汇,而不是先有这些词汇,才有这种现象和思考。国内比较权威的思维语言关系研究专家曾经撰文指出,语言和思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存在非语言思维的事实^[8];再次,在语言产生之前,难道人类就没有思维活动了吗?所以,“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思维”^[9]。还有很多学者也是持这一观点的,如张思洁、张柏然、齐荣军等^[10-11]。

(二) 思维的共性和个性

对思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缺少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当讨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这里说的思维个性,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民族思维”。关于“思维”和“民族思维”二者的区别,很多学者并没有加以明确区分。笔者稍作分析将有利于澄清各种争论。我们知道“思维”指的是基于人脑机能之上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过程。它是思维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脑对信息的加工、输送、存储和使用而产生的各种思维过程、思维环节和内部结构,也包括这些环节在实际思维中的组合模型和演化过程。这种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确是人类的共性,没有民族性。而相当一部分人所提到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等,其内涵属于“思维的个性”或“民族思维”,即在民族的文化行为中,那些长久地稳定而普遍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及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众所公认的观点。这种民族思维体现了该民族的心理特点,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近年来对英汉思维差异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如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引者注),直接与间接(直线与曲线——引者注),主静求同与尚变求异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两种语言相应的有所不同^[12]。其中整体综合与个体分析的差异尤为根本和显著,这也正是导致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深刻原因。

季羨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13]很多学者对此

也做了大量研究,赞同这样的看法。其实东西方思维差异可从各自第一哲学中找到答案。作为中国第一哲学的道论,从诞生时起就打上了实物的烙印,而不是从纯粹形式的逻辑方面去规定的。“道”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合一”,这也是主宰东方文化的最高思想范畴^[9]。(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汉民族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综合的整体,崇尚“天人合一”的信念,不喜将事物割裂开来对待,而习惯于从总体上融会贯通、辩证把握。这种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思想观点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了汉民族所习惯的整体思维框架。而综合型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无词形的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依靠词汇手段,组词造句中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

对英语民族(以及其他西方民族)来说,“本体论”是其第一哲学,其首要特征是“概念的逻辑关系”。本体论从建立之日起就规定“是”(Being)和“是者”(Beings)为其最高最普遍的范畴,因此“是”和其余哲学范畴建立了“种”和各个层次上的“属类”之间的关系,这为本体论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受第一哲学本体论巨大影响的西方民族包括英民族,倾向于以分解的观点看世界,“……倾向于将事物进行分解剖析以求充分了解。他们将重点放在事物的部分而非整体”^[14]。他们强调物我、人我之间的界限划分,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物质与精神对立,强调差异分析,尽力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搞得清楚透彻、泾渭分明。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其或主对立而不主调和、重分解而不重合的倾向,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以矛盾律和排中律两个公理为基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想将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楚。

三、思维的共性和个性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是思维决定语言。那么相应的,思维既然有共性,那么语言也就有共性,世界上几千种语言虽然差异很多,但有其“同”的一面。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面临的世界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过我们这里说的语言的“同”,应该是高度抽象的“同”,是在经过调查足够多的语言的个性基础上得出的“同”,而不

是某些学者根据一种语言所挖掘出的“普遍原则参数”。这些对一种或少数语言的研究得出的“原则”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遭到了包括西方语言研究者的反对。

同样,思维的个性也即民族思维决定了不同语言如英语和汉语的差别。我们常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正是由于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中国思维方式的不同的导致的。我们目前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常见的误区是泛泛地谈思维决定语言,从思维方式角度探讨语言差异是没有区分两者的共性和个性。

“思维”是思维的共性,没有民族性,当然不能决定各个民族语言的差异,而民族思维方式则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它对人类文化起支配作用。语言也属于文化,而且是特殊的文化现象。上文已经指出,该民族的思维决定了该民族语言的特点。因此,民族思维的差异决定了民族语言的差异。当然各个民族语言的差异原因有很多,但这当中民族思维差异是最本质的原因,而且其他原因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所以暂不予涉及。

各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民族语言上的差异。正是由于西方人重抽象思维的特点,使得英语具有明显的词形变化,形式多样的语法形式和组词造句中较为灵活的语序结构。而中国人重形象思维,中文则重意合,语言组织缺少形态变化。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正是语言学上的辩证法:个性普遍存在,是永恒的、无条件的,共性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关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Humboldt的论述可谓精妙:

“在语言中,个别化和普遍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9]“这样看来,差异便是同一,分离即是共有……”^[15]。

目前相对于英语,汉语作为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对它的研究却远远不够。我们至今尚拿不出一部系统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书。随着国际交往民族文化的交流加深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上对汉语感兴趣的人多起来了,出现了一股“汉语热”。然而,我们在教外国人汉语时候,往往会觉得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汉语研究不够。另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机器对自然语言的识别和处理也急需汉语研究的深化。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学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汉语研究者

寻找汉语的语料去证明西方的所谓普遍语法是有“普世性”的。如果汉语没有这种特点,也想努力寻找一些像英语那样的普世语言具有的特点,似乎如果找不到这些特点,就说明汉语研究落后,没有与国际接轨。而我们通过以上分析知道,汉语和英汉属于不同的语系,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不能照搬西方语言的“原则”,盲目向其靠拢。

四、结语和启示

综上所述,思维分为一般思维和民族思维,同样,语言有共性和个性。思维的一般性决定了汉英语言的共性,思维的民族性决定了英汉语言的差异性。语言的共性寓于差异性之中,没有差异性就无所谓普遍性。我们不能片面地求得语言的普遍性,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对世界上足够多的语言做出系统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汉语这一和英语差别巨大的语言,远远没有得到足够透彻的研究,那么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语言普遍性经得起推敲吗?我们应该在比较全面地探求各种语言特性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出语言的共性。汉语研究,目前跟不上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比如人工智能,翻译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急需对汉语做出透彻的研究,所以我们目前应加强汉语的研究,而不能忽视汉语的特点,一味向英语靠拢,去证明建立在少数印欧语基础之上的语言“规则”的普世性。

参考文献

- [1] 吴刚. 生成语法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6.
- [2] 程工. 语言共性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3] 林明东. 论语言普遍性的多维度存在[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2007, (4): 121-124.
- [4] Humboldt, Wilhelm von.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Heath.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6: 90-114.
- [5] 潘文国. 语言学是入学[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1-4.
- [6]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A]. 王力文集: 第一卷[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
- [7] 潘文国, 谭慧敏. 对比语言学: 历史与哲学思考[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198-199.

[8] 王小璐, 李恒威, 唐孝威. 语言思维与非语言思维[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5): 29-36.

[9] 胡翠娥. 中西思维差异与汉英语言特点之关系[J]. 南开学报, 1999, (3): 30.

[10] 张思洁, 张柏然. 试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6, (5): 8-12.

[11] 齐荣军.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新解[J].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55-56.

[12] 张爱琳, 张爱文. 论英汉思维方式差异[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5): 81-86.

[13]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16.

[14] HUMBOLDT W von. On Language: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eter Heath[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6: 53-60.

[15] HUMBOLDT W von. 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en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M].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o Xiaoqing, in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226-422.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inking

LI Hong-lia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concerning languag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language circles. Some try to figure out the universality of languages, while others emphasize the individuality of each language. This paper holds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like other languages, share both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Thinking determines language, s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two languages originates from that of thinking, and their individuality derives from the national thinking differences. The universality of languages is based on the individuality of each language, and at present we should lay stres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individualit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universality of thinking; individuality of thinking; study of Chinese individuality

编辑 刘 波

· 学术广角 ·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作者邓晓芒在2009年4期《世界哲学》上撰文,称: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同时又把对象当自我看的意识,但对象和自我本来是不同的,因此自我意识里面包含一个自欺结构。这种结构从形式逻辑和日常意识来看是自相矛盾的,必然导致无穷后退并引出一个上帝;但从辩证法来理解则正是主体的能动性之源。这种有意识的自欺使人生成为艺术,但也体现了人性的“根本恶”,能够调解这种自相矛盾的只有忏悔。忏悔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深入的无限过程,只有在这一反思和怀疑的过程中,人性才能越来越真诚。其结论是,人的自我(或自我意识)具有摆脱不了的自欺的本质结构,以各种办法抹杀和无视这一结构,便形成一种自欺的人格;而只有正视这一自欺结构,承认它、反思它、批判它,才能在动态中建立一种独立的人格模式。自我批判和自我忏悔是独立人格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伪善的剋星。

· 宣 文 ·